

东亚经纬

2024年第1期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荣花物语》中的立后条件（彭 溱）.....	1
入宋僧白云惠晓与日本中世禅林中的“菖蒲茶”（王 悦）.....	5
日本经贸政策选择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镜鉴（李博文）.....	10
日野原重明与日本新老人运动（许寿童）.....	13
赵朴初民间外交实践与“黄金纽带”（尹 虎）.....	18
邵亭金永爵《燕台琼瓜录》考述（李文哲）.....	25
◆学术动态.....	30
◆征稿启事.....	36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2024年6月30日

《荣花物语》中的立后条件

浙江工商大学东语学院 彭 溱

《荣花物语》作为日本首部历史物语，采用编年体，以女性的视角讲述了平安时代宇多朝至堀河朝期间约 200 年的历史。作品着力刻画藤原北家九条流的繁荣史。当时，藤原北家将族中女子送入后宫，凭借外戚身份，世袭摄政、关白之职，把控朝政。多方势力角逐的后宫是藤原北家权力的主要来源，因而也成为《荣花物语》的重点叙述对象。叙述后宫历史时，历任天皇的立后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重要话题。其中，如何确定皇后人选，即所谓的立后条件，作品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这方面的叙述，能反映出作品对于立后的态度主张与书写逻辑。本文从立后条件的角度，探讨《荣花物语》历史叙述的主要特点。

一、卷三十六提出的立后条件

关于立后条件，作品卷三十六中有较明确的记载。该卷提到“非摄关之女，且无子嗣的妃子，没有立后之先例”。日本学者福长进指出，该句言明了藤氏女子的立后条件，不同于内亲王立后的情况，藤氏女子立后，至少需满足摄关之女、育有皇子其中一项条件。并且，福长氏指出卷三十六透露的这两项条件符合《荣花物语》中所有藤氏女子立后的情况，是作品历史叙述的立脚点之一。

《荣花物语》共有 15 处对于立后的描写，分别是：卷一的藤原安子、昌子内亲王立后，卷二的藤原皇子、藤原遵子立后，卷三的藤原诠子、藤原定子立后，卷六的藤原彰子立后，卷十的藤原妍子、藤原娥子立后，卷十四的藤原威子立后，卷三十四的禎子内亲王、藤原媛子立后，卷三十六的章子内亲王、藤原宽子立后，卷三十九的藤原贤子立后。其中，藤原诠子较为特殊，其立后并非立皇后，而是在儿子一条天皇统治时期立为皇太后。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剩余的 14 名女性中，除了 3 名出身皇室的内亲王，其余 11 名都是藤原北家的女性。下表为这 14 名女性立后时的父亲官职、生育子女等情况。

皇后	父亲(当时官职)	配偶	立后时生育情况
藤原安子	藤原师辅(右大臣)	村上天皇	承子内亲王(早逝)、宪平·为平亲王、辅子·资子内亲王
昌子内亲王	朱雀天皇	冷泉天皇	
藤原媞子	藤原兼通(关白·内大臣)	圆融天皇	
藤原遵子	藤原赖忠(关白·太政大臣)	圆融天皇	
藤原定子	藤原道隆(摄政·内大臣)	一条天皇	
藤原彰子	藤原道長(内览·左大臣)	一条天皇	
藤原妍子	藤原道長(内览·左大臣)	三条天皇	
藤原娥子	藤原济时(大纳言·赠右大臣)	三条天皇	敦明·敦仪·敦平亲王、当子·禊子内亲王、师明亲王
藤原威子	藤原道長(前摄政·太政大臣)	后一条天皇	
祢子内亲王	三条天皇	后朱雀天皇	良子·娟子内亲王、尊仁亲王
藤原姬子	养父藤原赖通(关白·左大臣)	后朱雀天皇	
章子内亲王	后一条天皇	后冷泉天皇	
藤原宽子	藤原赖通(关白·左大臣)	后冷泉天皇	
藤原贤子	养父藤原师实(左大臣)	白河天皇	

通过上表可知，11名藤原氏皇后中，藤原安子、藤原娥子是在育有皇子的情况下立后的，其余9名藤原氏皇后则是有赖于父亲的政治地位。这9名皇后中，只有藤原彰子、藤原妍子、藤原贤子的父亲当时还未至摄政、关白之位。但实际上这3名皇后的父亲在当时也已位极人臣了，其中藤原道长的内览之职更是与关白地位无甚区别。且《荣花物语》未及叙述的藤氏女子立后还有1例，即后冷泉天皇的妃子藤原欢子之立后，而藤原欢子的父亲在其立后时也是关白。因此，卷三十六所提出的立后条件——摄关之女或育有皇子，确实基本符合《荣花物语》所涉及历史时期的实情。值得注意的是，卷三十六提出的这两项条件，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作品之中，而是植根于各卷的叙述当中。这可从作品中的两个关键词“后がね”“素腹の后”进行分析。

二、“后がね”与立后条件

“后がね”指未来皇后之人选、皇后候选人。该词在《荣华物语》中出现了7次。这7例“后がね”分别用于：左大臣源雅信的两个女儿（卷三）、左京大夫藤原道长的长女藤原彰子（卷三）、内大臣藤原伊周的两个女儿（卷四），中将藤原赖宗的长女（卷九）、大纳言藤原实资的女儿藤原千古（卷十六）、关白藤原赖通的养女藤原媞子（卷十七）、内大臣藤原教通的长女藤原生子（卷三十六）。其中，左大臣源雅信的两个女儿，并非藤原氏，卷三虽然提到源雅信将两个女儿作为“后がね”来培养，但在摄关政治时代，最终还是未能与藤原氏相对抗，两个女儿成年后都未能入宫，而是嫁入了藤原氏。以下分别探讨其他6个藤氏女子的“后がね”用例。

卷三在描写藤原道长女儿彰子诞生时写到，全家上下都将这个最先降生的女儿看作“后がね”，藤原道长的父亲、摄政藤原兼家也多次表达喜悦之情，彰子出生后的三次庆祝仪式分别由外祖父源雅信、祖父藤原兼家、姑母藤原詮子（当时的太后，一条天皇母亲，藤原兼家女儿）主办。根据这段描述，藤原彰子一出生便是众人眼中的未来皇后人选。但实际上，藤原彰子在家族同辈中并非最年长的女孩，她还有堂姐藤原定子和藤原原子。这两人后来分别嫁给一条天皇和太子居贞亲王，且藤原定子还得以立后。若非两人的父亲藤原道隆早逝，藤原道长恐怕也无缘成为掌权者，藤原彰子的立后也恐难实现。因此，藤原彰子的“后がね”用例，是立足于之后的历史事实而预先安排在卷三中的。

卷十七中藤原嬉子的用例也与藤原彰子的用例类似。藤原嬉子是藤原道长的小女儿，藤原道长出家后，她以哥哥藤原赖通（时任关白）的养女身份嫁给太子敦良亲王，被众人看作“后がね”。不过，藤原嬉子因早逝之故，没有立后。

以上这 2 例都意在烘托藤原北家九条流的辉煌，剩余的 4 例则传达出藤原北家其他流派，甚至是九条流内部旁支的悲哀。在卷四中，藤原伊周是时任关白藤原道隆的长子，他将女儿视为“后がね”。但后来藤原道隆病逝，“中关白家”（九条流藤原道隆一脉）迅速没落，被“御堂关白家”（九条流藤原道长一脉）所取代。藤原伊周的两个女儿最终也都依附于藤原道长一脉，未能嫁入后宫。在卷九中，嫁给藤原赖宗的伊周长女生下女孩，这个女孩是藤原道长的第一个孙女，被藤原道长视为“后がね”。但后来，藤原道长的嫡系孙女、外孙女相继出生，这名大孙女似乎也被他遗忘了。最后，藤原赖宗将女儿嫁给了退出权力中心的小一条院。在卷十六中，藤原实资升任右大臣的前一年，被描写为“大臣がね”（未来大臣人选），他建造了气派的府邸，将女儿藤原千古视为“后がね”，细心养育。但藤原北家小野宫流的藤原实资即使升任了右大臣，也无法与九条流相抗衡，藤原千古之后的婚配在后文中也再无提及。历史上，她后来嫁给了属九条流的藤原兼赖。在卷三十六中，藤原教通将长女藤原生子当作“后がね”来培养，但因迟迟未能从哥哥藤原赖通那里继承关白之位，导致既非摄关之女、又未生下皇子的藤原生子错失后位。

以上 7 例“后がね”中，只有藤原彰子得以立后，其妹妹藤原嬉子若非早逝，也能成为皇后，事实上，藤原嬉子所生皇子即位后，她被追赠为了皇太后。与这 2 例相反，其余 5 例“后がね”都未能立后。藤原彰子、藤原嬉子之所以能够立后，是因为她们的后盾是关白（藤原道长的内览之职相当于关白），而其余未立后女性的父亲皆地位不及摄政、关白。这些“后がね”的用例，印证了摄关之女这个立后条件。

三、“素腹の后”与立后条件

“素腹の后”指没有生育子女的皇后、无所出的皇后。这个词在作品中仅出现了一次，却值得深思，因为作品所刻画的诸多皇后中，绝大多数在立后时都是“素腹の后”，但只有藤原遵子被描写为“素腹の后”。

在卷二中，圆融天皇不立育有皇子的藤原詮子，而是立无所出的藤原遵子为后，遭到世人非议，藤原遵子被世人戏称“素腹の后”。藤原遵子没有生育，父亲是当时的关白兼太政大臣藤原赖忠；藤原詮子育有皇子，父亲是当时的右大臣藤原兼家。也就是说，当两个妃子一个满足摄关之女的立后条件，另一个满足育有皇子的立后条件时，这段叙述站在了优先后者的立场上。但其实，这样的立场在作品中并不是固定的。在卷十中，三条天皇起初立藤原妍子为后，之后又立藤原娥子为后。藤原妍子没有生育，父亲是当时的内览（相当于关白）兼左大臣藤原道长；藤原娥子育有四子两女，父亲是已故大纳言藤原济时。藤原妍子满足摄关之女的立后条件，藤原娥子满足育有皇子的立后条件，藤原妍子先于藤原娥子立后，也就是说，这里与卷二的情况相反，优先了摄关之女的条件。但卷二中，作为摄关之女的藤原遵子遭受了“素腹の后”的批判，而同样因摄关之女条件立后的藤原妍子，在卷十中却没有受到任何批判，反而只有赞美之词。

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人物所属的流派上。卷二中的藤原遵子与藤原詮子，前者属于藤原北家小野宫流，后者属于藤原北家九条流；卷十中的藤原妍子与藤原娥子，前者属于藤原北家九条流，后者属于藤原北家小一条流。在立后上，没有皇子的小野宫流藤原遵子胜过育有皇子的小一条流藤原娥子时，作品批判藤原遵子是“素腹の后”；而没有皇子的小一条流藤原妍子胜过育有皇子的小一条流藤原娥子时，作品却未加任何批判。很明显，摄关之女和育有皇子两个立后条件应该优先哪个，作品的立场并未固定，但在拥护、赞美九条流这点上，作品的立场却是坚定的。事实上，作品中九条流的藤原皇后、藤原定子、藤原彰子、藤原妍子、藤原威子、藤原媛子、藤原宽子、藤原贤子都是在“素腹”之时立后，但作品在叙述她们的立后时，从未对此加以批判。

《荣花物语》卷三十六提出的摄关之女、育有皇子两项立后条件，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且融入到作品各卷的历史叙述当中。其中，“后がね”的描写凸显了摄关之女的立后条件，“素腹の后”的描写聚焦了育有皇子的立后条件。两者侧重的方面虽有不同，但都是站在拥护九条流、烘托其荣华的立场，去书写历史的。这既是作品历史叙述的特点，也是其内在的书写逻辑。

入宋僧白云惠晓与日本中世禅林中的“菖蒲茶”

浙江工商大学东语学院 王悦

菖蒲为中国南方常见植物，农历五月前后生长尤为茂盛，叶呈剑状，芳香独特，因而在端午时节人们或将菖蒲悬于门户、或佩戴于颈项，以辟邪祛病。南北朝的笔记体文集《荆楚岁时记》记载：“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菖蒲中某些品种的根茎有醒神益智等药用功效，由此可见菖蒲的文化价值不仅仅局限于观赏层面，还早已拓宽至食疗层面。至宋代，禅僧在端午时节“以茶代酒”，“菖蒲茶”便诞生在宋代禅寺中，北宋时期洪州（今江西南昌）龙安慧照禅师最早在端午上堂时品饮菖蒲茶，并曰“一盏菖蒲茶，数个砂糖粽”，此后端午饮菖蒲茶的习俗在江西、江浙一带的禅寺中广泛流传开来。

端午的民间传统习俗早在奈良时代以前就已传入日本。公元894年遣唐使制度被废止后，中日两国间的官方外交虽被迫终止，但民间商人和中日僧侣的往来却依旧活跃。至南宋时期（大致为日本镰仓时期），往返于海途间的中日禅僧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以非官方的形式掀起了又一个高峰，与端午相关的其他习俗也伴随着禅文化一起被再次传入日本。“端午饮菖蒲茶”的仪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两国渡海禅僧之手被引入日本禅林中的。

一、入宋日僧白云惠晓

白云惠晓（1223-1297），日本镰仓时期临济宗圣一派僧人。初在日本比睿山泉涌寺修律宗，后投京都东福寺圆尔修习禅宗。文永三年（1266）入宋，遍参两浙，期间于明州（今浙江宁波）瑞岩寺希叟绍昙禅师门下证悟，得其印可后即于弘安二年（1279）归国，正应五年（1292）受请担任东福寺第四世住持。

惠晓入宋后的足迹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从现藏于日本的两幅宋僧墨迹（《溪西广泽墨迹 白云慧晓宛偈语》《断溪妙用墨迹 白云慧晓宛雅号偈》）的落款时间来看，惠晓曾在入宋后不久的1269年，先后参访了溪西广泽、断溪妙用禅师，并得二师赠偈。此后惠晓一心投明州瑞岩寺希叟绍昙会下参禅。

希叟绍昙（？-？），西蜀（今四川）人，嗣法径山无准师范禅师，禅风远播海外，除惠晓外至少还有十位日本僧人曾参访希叟禅师。希叟自咸淳五年（1269）起，住庆元府瑞岩寺，因而可以推知惠晓赴希叟门下参禅应是在1269年之后。又《元亨释书 惠晓传》中记载“一日室中举起百丈拨火公案，言下有省适附商舶而归”，即惠晓在希叟门下开悟后便立即着手准备归国（1279年），由此可见惠晓追随希叟绍昙参禅的时间很有可能长达十年。《佛照禅师塔铭》中也

记载了惠晓在希叟会下因“百丈拨火”公案而顿悟一事：

一日室中举百丈拨火话。到汝道无者々。师于言下大悟。诸方英衲惊骇。自慊不已。己卯复回本国。国中僧俗莫不钦赞。

惠晓在希叟门下苦修禅法的同时，也在耳濡目染中潜心学习南宋禅林中的规矩制度，考《东福寺志》正应五年（1292）条记载“春。白雲惠曉、東福寺に視篆す、第四世となり、・・・冬。白雲惠曉、東福寺の規矩を整へ”，即惠晓任东福寺第四世住持后便立即整改东福寺内的规矩，虽然具体条例未见记录，但应当也可窥见其中南宋禅林规矩之残影。综上所述，惠晓入宋十四载，不但悟出禅法之奥蕴，也学得独具特色的南宋禅林文化，这对于中世日本禅林的发展来说又是一次新鲜的文化刺激。

二、中日禅林中的“菖蒲茶”

僧人于端午饮菖蒲茶这一仪式，最早见于宋代禅寺。端午起源于上古时代，是集合拜神祭祖、驱邪攘灾、饮食娱乐为一体的复合性节日；至唐代，端午也用于纪念五月五投江自尽的伟大诗人屈原，并出现食用粽子的习俗；此后民间又陆续形成了赛龙舟、饮用菖蒲酒、雄黄酒等习俗，以此驱散毒气、禳灾祈福；端午习俗于宋代流入禅林中，《禅林象器笺》云：“此日饮菖蒲酒，僧家以茶代之，准世礼也”。佛教五戒中严格规定出家人“不饮酒”，宋僧便决定以茶代酒欢度端午；至元代，这一仪式作为固定的禅寺制度被载入《敕修百丈清规》中：“五月，端午日早晨，知事僧堂内烧香点菖蒲茶”。菖蒲茶虽苦、但其香可以袪秽，这一点逐渐成为宋元禅林僧众的共识。

其后，端午上堂饮菖蒲茶这一仪式作为禅寺内的定制，最早于镰仓时期被引入日本禅林。据日本学者馆隆志氏考察，在镰仓时期的日本禅林中，于端午上堂时品饮菖蒲茶的事迹仅可见于兰溪道隆《兰溪和尚语录》、大休正念《大休和尚语录》、白云慧晓《佛照禅师语录》中。

禅僧	简介	与“菖蒲茶”相关的记载	史料出处
兰溪道隆	渡日宋僧。1246年赴日，1278年在日圆寂。镰仓建长寺开山，以镰仓为中心大力传播南宋禅林文化。	下座巡堂喫茶	《大觉禅师语录》建长寺语录 端午上堂
大休正念	渡日宋僧。1269年赴日，1289年在日圆寂。历	玉蒲浮緑茗啜了。	《大休和尚语录》建长寺语录 端午上堂

	住寿福、圆觉、建长诸禅寺。		
白云慧晓	来华日僧。1266 年入宋，1279 年归国。东福寺第四世住持。	和茶只吃石菖蒲。细切菖蒲和茶吃。	《佛照禅师语录》端午上堂

兰溪道隆赴日后主要以镰仓为中心传播禅法，而惠晓入宋前基本活跃在京都一带，因而惠晓从道隆处承袭“端午饮菖蒲茶”仪式的可能性不大；大休正念赴日之年，惠晓早已身处宋地异国，因而也不具备可能性。那么白云慧晓又是如何能够掌握如此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思想的“节庆饮茶”仪式？笔者猜想这应当与惠晓入宋求法的经历有着密切关联，首先将目光转向白云惠晓禅师语录中的“菖蒲茶”。

三、白云惠晓禅师语录中的“菖蒲茶”

所谓语录，是记录禅僧生平的言论，自上堂、小参、普说、拈古、法语以至偈颂、佛祖赞、自赞、题跋、书简等，广泛辑录、编成全集。在白云惠晓禅师的语录中，存有八处关于饮茶的相关记载，尤其是有两处明确地表述了所饮茶为“菖蒲”、“石菖蒲”¹，兹摘录如下：

端午上堂。不悬肘后符。何贴白泽图。衲僧门下无妖怪。和茶只吃石菖蒲。石菖蒲吃了。佛病祖病禅病见病。八万四千毛孔病。三百六十骨节病。今晨端午节一时尽殄灭尽殄灭。西川李道士击碎药葫芦。

端午上堂。黄面老子说一道神咒。唵摩尼达哩吽吽。三障四魔听之尽潜匿。大上老君书一道神符。五月端午天中节。赤口白舌急急如律令。千妖百怪见之皆窜伏。虽然如是。更有佛祖障魔还作自己妖怪。黄面老子不奈何。大上老君不知有。幸有木上座从壁角出头来书神符一行。佛祖障魔忽殄灭。自己妖怪已崩裂。是则是毕竟落着事如何靠。木上座归壁角。晓上坐下座。大众参堂去。细切菖蒲和茶吃。苦如檠。

从中可以发现：（1）惠晓禅师两次饮用菖蒲茶均发生在“端午上堂”这一特定场合之下，且惠晓认为菖蒲具有殄灭千妖、消除百病之功效。（2）“和茶只吃石菖蒲”中的“只”字更是高度强调了惠晓对于石菖蒲的重视与喜爱。（3）由“细切菖蒲和茶吃”“和茶只吃石菖蒲”的描述可见，惠晓禅师饮用菖蒲茶的形式应为“点茶式”，即将菖蒲细细碾碎后与茶叶混合，再注汤击沸点饮。

上述惠晓对于“菖蒲茶”可以灭妖祛病的认知，以及饮用菖蒲茶时采用的“点茶式”法，

¹ 石菖蒲：系为菖蒲中的一种。其干燥根茎可入药，可理气化痰开窍。语录中所提“菖蒲”应当均指“石菖蒲”。

究竟是从何处习得的呢？

四、希叟绍昙禅师与“菖蒲茶”

前面已经提到，惠晓在华期间追随希叟绍昙参禅的时间最长。在希叟主持的端午上堂仪式中，至少六次可见菖蒲茶的身影，可见希叟禅师对菖蒲茶是极为重视的。具体情况可参考《希叟禅师语录》及《希叟禅师广录》：

端午上堂。紫芝峰下。小小山居。家风淡薄。堂供萧疏。菱粽叶包蒸米饭。野山茶点石菖蒲。

端午上堂。…不须悬白泽。何用食菖蒲。千妖百怪尽消除。

端午上堂。大地药除。众生病去。文殊善财。不须多事。大家相聚吃盞菖蒲茶。几枚菱粽子。

端午上堂。箬包角黍。茶点菖蒲。香浮毛孔。清透肌肤。肱枕梨床心醉月。驱邪何用挂神符。汨罗人去远。还有独醒无。

端午上堂。并谢灵叟。苦涩菖蒲茶。胶粘青莢粽。嗅着鼻头辛。咬得牙关肿。佛病祖病蠲除。妖星怪星惊悚。

端午上堂。小供天中节。家贫乐有余。弱包粳米粽。茶点石菖蒲。

在希叟禅师看来，虽是“苦涩石菖蒲”，甚至“嗅着鼻头辛，咬得牙关肿”，但服用后却可令“佛病祖病蠲除，妖星怪星惊悚”，充分肯定了菖蒲茶的驱妖妙用与药用疗效；“野山茶点石菖蒲”一句表明，希叟禅师饮菖蒲茶时也同样采用了“点茶式”饮茶法。由此看来，惠晓在僧堂下专心领悟师父法语、认真研习“点菖蒲”饮茶法的形象似乎跃然纸上。

惠晓归国后任东福寺住持期间，积极效仿希叟禅师，在端午上堂说法时邀堂下众僧一同品饮“菖蒲茶”，大力传播“菖蒲茶”文化。不仅如此，惠晓还曾作偈普请东福寺内的修行僧一同来种茶，曰“要得年年云脚好，大家普请做雷同”，由此可以窥见，惠晓对于饮茶一事也是较为积极的。综上，笔者认为，白云慧晓在华时学习南宋禅林的制度仪式，归国后积极实践于日本中世的禅林生活中，这是宋元时期中日禅林文化交流史的生动写照之一。

白云惠晓禅师在宋十四年，不仅结交高德、求得证悟，还将希叟禅师所重视的“端午饮菖蒲茶”仪式携归日本，并以东福寺为据点发扬光大。在“菖蒲茶”初传日本的镰仓初期，虽另有建长寺兰溪道隆、大休正念二师也曾在“端午上堂”时品饮“菖蒲茶”，但二师皆为东渡宋僧，将本朝规矩移植到日本禅林中实属自然，且他们对于“菖蒲茶”的表述模糊、更未提及饮用方法。相较之下，惠晓任东福住持时，不仅在端午上堂时当众示范如何饮用菖蒲茶，甚至高调表

明“和茶只吃石菖蒲”。从微观上看，这是日僧惠晓个人对于发达的南宋禅林文化的高度认同与积极受容，从宏观上看，这也是宋元时期来华日僧全面移植江南禅林先进文化的缩影之一。综上，在日本禅林受容南宋禅林“菖蒲茶”文化的过程中，日本白云惠晓禅师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端午饮菖蒲茶的习俗自镰仓时期传入日本禅林后，逐渐发展出其独有的性格和走向。日本中世五山禅僧雪村友梅（1290-1346）的语录中记载“玻璃盏内泛菖蒲”，表明当时禅林内还有僧人用玻璃器皿饮用菖蒲茶。从正宗龙统（1428-1498）、天猷玄晃（1518-1602）等日本中世后期禅僧的语录中，仍可寻得“端午饮菖蒲茶”的痕迹。到了江户时期，日本人意识中“端午”的节日内涵开始由“驱邪”转向“祝（福）”，禅林中的菖蒲茶也逐渐转变为一种“祝茶”，“菖蒲茶”作为南宋禅林仪式导入日本禅林后发生了明显的“日本化”转向。

叶渭渠先生在概括日本文化的发展机制时说到，“日本文化创造性的发展，坚持了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本土文化的主体作用；一是坚持多层次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以禅宗为中心的多元大陆文化，由宋元时期中日文化的主要载体——禅僧带回日本后，在模仿与创新的文化发展机制中不断打磨塑造，便造就了日本禅林文化、乃至整个日本文化的独特风景。

日本经贸政策选择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镜鉴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国际商学院 李博文

中国与日本同为后发赶超国家，现代化道路存在相似之处。上世纪 80 年代前后，日本经济面临美国主导的外部摩擦压力，以及国内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诉求。但是，接踵而至的泡沫经济及其破灭让日本经济进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萧条。当前，中国同样面临内部经济增速换挡、外部经贸摩擦加剧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应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充分汲取泡沫经济前后日本对外贸易、投资、产业政策选择的经验教训。

一、泡沫经济前后日本对外经贸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收支失衡，日美经贸博弈加剧

日美贸易摩擦从上世纪 50 年代就在纺织行业初现端倪，随后数十年间，两国博弈的焦点先后从家电、钢铁、汽车，再到半导体等诸多领域全面升级。在贸易立国战略主导下日本大量出口、少量进口，在 80 年代对美国积累了超过 3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成为该阶段两国全方位结构性冲突的导火索。在汽车产业，当日本汽车充斥美国市场时，美国迫使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数量，随后日本车企选择在美国直接投资设厂；在半导体产业，当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份额过高时，美国迫使日本达成附加结果导向的量化目标。量化目标政策让美国企业占据了日本半导体市场的重要份额，而投资美国汽车市场不仅收益率低下还引发了美日投资摩擦等新问题，这些有悖于日本经济利益的行为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美国经贸博弈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二）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竞争两端挤压

对外经贸政策需要良性的产业结构支撑，但泡沫经济前后日本产业结构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呈现失衡。在供给侧，技术革新低迷、资源分配扭曲、产业空洞化和产业结构转化延迟等问题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低下。在需求侧，投资消费需求低迷，诱发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的需求不足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僵化。具体来说，彼时日本产业在面临国际竞争时面临两端挤压。一方面，日本向信息产业结构升级中逐渐落后于美国，且传统技术优势产业如半导体出现颓势再度被欧美赶超，许多日本科技巨头逐渐被市场淘汰。另一方面，日美贸易摩擦引致的日元升值、高昂的人力成本、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等问题让日本的传统制造业面临韩国、中国和东盟的挤压。

二、泡沫经济前后日本对外经贸布局

（一）贸易政策：以战略性政策实现贸易立国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由来已久，“保护产业→培育优势→扶持出口”是其一以贯之的主线。在泡沫经济崩溃前，日本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以及技术密集型的高新产业，同时推行贸易自由化战略和多元化进出口市场以保障贸易利得。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并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试图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总之，泡沫经济前后日本政府在贸易立国战略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发掘战略性产业，对于本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均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埋下贸易摩擦的种子。

（二）投资政策：从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转型。

泡沫经济崩溃前，日本在贸易立国战略的引导下片面追求出口贸易增长，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欧美国家要求日本主动限制出口以减少贸易盈余，并借助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以削弱日本制品的成本优势。为此，日本加速了向投资立国战略的转型。一方面，日本大幅度增加了对海外市场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直接投资，通过“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模式减少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日本在“雁阵模式”下扩大对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并以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的形式将最终产业出口环节转移至中国和东盟等国，本国仅负责关键中间品零部件的出口环节。这种迂回生产、迂回出口的方式使得日本将其与欧美贸易失衡的矛盾转嫁到了中国。

（三）产业政策：从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转型。

日本产业政策发展方向具有时代特征。上世纪 70 年代，重化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冲击，使日本政府开始了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战略转变。该产业政策注重生产并出口资源能源消耗少、附加值高的知识密集型产品，使日本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泡沫经济崩溃后，鉴于经济负增长、债务负担重，经济结构改革成为日本产业政策的关键词。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着重开发新的产业领域，并将现有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进入 21 世纪，日本提出发展科技创新与满足社会需求并举的产业政策，传统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并进一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日本经贸政策选择对浙江省的启示

（一）做好中美经贸博弈长期化和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在对美经贸博弈的过程中，虽处于不同时期，中日两国在引发摩擦的原因、发生摩擦的行业、美国的制裁措施及应对策略等方面均极为相似。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经贸博弈乃至战略竞争，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美经济关系的新常态，也是影响浙江、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变量。中美经贸博弈进程预计将经历战略试探、战略摊牌、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四个阶段，需要浙江在对外商贸布局中做好中美经贸博弈长期化和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二）在 RCEP 框架下延伸“雁阵模式”缓解贸易失衡

当前，浙江外贸企业发展面临欧美国家制造业回流和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业崛起的两端挤压。延续日本“雁阵模式”产业转移，浙江应首先动态评估省内各产业的比较优势，然后在 RCEP 框架下充分运用原产地规则，具体做法有三：一是省内保留部分附加值高的中间加工环节，二是附加值较低的中间加工环节转移至长三角的腹地或中西部省份，三是将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最终组装环节转移至越南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盟国家。总之，在动态评估比较优势后进行“迂回生产、迂回出口”，有利于延续浙江省相关产业比较优势，在产业上游攫取垄断利润，并缓解过去由中国大量出口最终产品引致的贸易失衡问题。

（三）产业与贸易政策双轮驱动，产业外移应注意次序

浙江在培育未来优势产业时应注重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双轮驱动，通过“保护产业→培育优势→扶持出口”的流程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创新驱动和新旧动力转换。浙江在对外产业转移时应高度注意次序和步伐，对于劳动密集、污染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等不同类型的产业区别对待，谨防产业外移过快造成日本当前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尤其针对白色家电等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应优先考虑与中国中西部省份寻求合作，避免重蹈日本制造业空心化的覆辙，造成税源减少和工作岗位外流等问题。

（四）从模仿到原创转型要找准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

日本通过模仿先发国家产业选择一度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当日本与先发国家差距迫近时模仿路径也不再明晰，之后日本出现战略性误判，未能把握信息技术革命机遇，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泥潭。反思日本教训，在从模仿到原创转型的关键环节，浙江应首先用好省内外、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智力支持。然后在加强科技研发和创新投入、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找准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本研究为浙江省哲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重点课题“RCEP 框架下浙江扩大与日韩经贸合作促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2ZDDYZS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日野原重明与日本新老人运动

三亚学院 人文学院 许寿童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针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社会，著名医生日野原重明提出了“新老人”定义，在“关爱、开创、忍耐”的口号下，展开了别开生面的新老人运动。新老人运动提倡老年人自立，加强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为下一代教育、环境保护与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新老人运动试图改变将老人视为体弱多病和社会负担的传统观念，树立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余生和为社会做出独特贡献的新老人形象。

新老人运动为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社会指明了一种方向，它的普及也将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旨在提高高龄老人的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功能的新老人运动不但在日本蓬勃发展，而且在美国等世界部分地区也正在开花结果。我国的老龄化问题也任重道远，老年问题不比日本等发达国家轻松，日本的新老人运动对我国当下的老龄化问题极具借鉴意义。



新老人运动是由日本圣路加国际医院的日野原重明医生发起的。1911年，日野原出生于日本山口县，长大后就读于京都大学医学院。参加工作后，他在医疗领域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就。比如，他把健康检查带入日本，也把高血压、糖尿病等成人病改称为“生活习惯病”，他是在日本提倡预防医学的第一人。他还担任过日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国际内科医学会会长、日本音乐疗法学会会长、日本圣路加国际医院院长和皇室家庭医师等重要职务。日野原获得的日本最高荣誉奖“瑞宝章”和“文化勋章”等足以证明他在日本和世界医学界所取得的成就。“瑞宝章”的颁奖对象是在公共事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而“文化勋章”是针对科技和文化艺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颁发的。

日野原又是一名多产畅销书作者，他编著出版的图书超过300册，并且在2001年撰写的《良好的生活方式》一书销出140多万册，为人们的健康生活做出重要贡献。医学领域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及超级长寿使日野原成为很多日本人的偶像，也让他几乎成为国宝级人物。有媒体评价说，“如果不是医生日野原重明，日本长寿大国的称号还要晚来十几年”，这也许是对日野原丰功伟绩的最好概括。

日本是长寿大国，但长寿伴随着老龄社会和老年问题，日本处在老年人口多，老年问题多发的时代。一向关注老年问题的日野原重新思考老年人概念，提出了“新老人”定义。在他看

来，“新老人”是75岁以上能自理生活和坚持工作的健康老人。他认为，65岁至74岁的很多人身心健康，还在各行各业为社会服务，把他们当作高龄者加以管理是一种资源浪费。他想通过新老人运动给老年人注入新的活力，塑造崭新的新老人形象，进而让全体社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2000年9月，90岁的日野原在东京创立了新老人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在日野原会长的带领下，新老人会迅速发展起来，在日本全国掀起了一场老年人争当“新老人”的运动。截至2022年，分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新老人会分会发展到58个。九州地区还设有包括福岡、熊本、宮崎、鹿儿岛、长崎、大分、佐贺7个分会的地区新老人会联合会。可知，新老人会具备了总部—地区联合会—分会的分层组织结构。另外，受日本新老人运动的影响，墨西哥、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海外分会或当地新老人会。

日野原本人是新老人运动理念最忠实的践行者，是最能体现“新老人”风格的老人，也是日本最著名的“新老人”。90岁以后，他仍然担任一家大医院的理事长，坚持一星期义务看病3天。100岁以后，他依然穿梭于日本各地和世界各国进行演讲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新老人运动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发挥其余热。不断地进行挑战是日野原的另一个追求，103岁时，他第一次骑了马。他说，当他脚踏马镫，坐在马背上时，心中有一种征服天下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日野原作词作曲的《新老人之歌》成为新老人会会员们的爱唱歌曲。歌曲共分三节，歌词大意是，大家聚集在新老人会，肩并肩、齐心协力，去关爱、开创和忍耐，共同分享宝贵的生命历程。歌曲反映了新老人运动的三个口号和新老人们众志成城、共同度过辉煌余生的决心。

二

日野原将新老人会会员根据年龄分为三类：75岁以上为老年会员，61岁到74岁为年轻会员，20岁到60岁为协助会员。把70岁左右的老人规定为年轻会员是出乎人们想象的。因为，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已经是有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了。但新老人会要打破常规，让75岁以下的老人保持像年轻人一样的活力。与此同时，让20岁以上的中青年成为老年协会的会员也寓意深刻。他们的加入，一方面可以帮助新老人会开展各项活动，让新老人会保持活力和后继有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共同参与勾勒出10年或20年后的自己，并且通过与老年人的亲密接触可以提前体验只有高龄后才能体会到的很多事情。

2022年，三类会员的比例为老年会员48%、年轻会员37%、协助会员15%。会员的平均年龄是72岁，虽然有年轻一点的协助会员加入，但其平均年龄仍然不低。各类会员的年会费也不同，老年会员和年轻会员为1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650元左右），协助会员为5000日元。另外，老年夫妻同时加入时只收取1万日元年会费。1万日元年会费对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

来讲不算低，但考虑到这些会费大多用于老年人身上，所以总的来讲是符合实际的。对不同会员收取不同金额的会费的方法也比较合理。

新老人运动的理念体现在它提出的三个口号、五个目标和一个使命。“三个口号”分别是关爱（to love）、开创（be creative）和忍耐（to endure）。“关爱”表示得到他人的爱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关爱他人；“开创”即激起新的热情和兴趣，开始新的学习和体验；“忍耐”即学会克服进入老年期后不可避免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艰辛和烦恼。

新老人运动的口号取自著名精神医学家V·E·弗兰格尔的著作《夜与雾》，这本书是根据作者自己在法西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体验写成的，其强调人生无论面临多大苦难都会有生存意义和希望。

“五个目标”中的第一个是自立，即自立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传承日本的优秀文化。第二个是世界和平，即通过将老一代的战争体验及教训传达给下一代的方式，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第三个是为医学研究做贡献，即把自己身体、精神和习惯方面的健康信息提供给医疗研究机构，成为健康研究志愿者，为老年医学和治疗做出贡献。第四个是会员之间的交流，即通过促进会员们寻求新朋友，推动全国会员之间的交流，让老年生活更加丰富起来。最后一个感恩自然，即珍爱自然，感谢自然，普及良好的生活方式。阻止由于过度开发引起的不良文明现象也是感恩自然的一部分内容。

2006年，根据新老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一个使命”成为了运动的一项新内容，“向孩子们传达关爱与和平的重要性”就是该使命的核心。从以上口号、目标和使命中可以看出，新老人运动不仅仅是提倡自立，加强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丰富老年人自己的晚年生活这么简单。在他们看来，能够把终生积累下来的人生经验和智慧还原于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高龄老人大有人在。也就是说，新老人们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特点和优势向社会传递爱，感恩世界，给所有老年人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活方式。他们还会承担下一代的生命与和平教育，传承日本优秀文化以及为医疗研究与发展做出老年人自己的独特贡献。

三

新老人运动是长寿大国日本的高龄老人怎样保持健康和度过有意义的余生的具体提案。日本新老人会站在了这场运动的中心，在前述口号、目标和使命的指引下，东京和日本各地新老人会展开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一）社团活动。日野原作组建的新老人会社团具体包括合唱团、手铃乐器团、夏威夷舞蹈团、“走访今昔”史迹探访团、时事座谈会、读书会、诗朗诵会、读随笔会、自传撰写会、电脑教

室、英语教室、畅谈世界部、登山部、健康体操部、软式棒球部、丹田呼吸法部、飒爽行步会、体育吹矢部、奥运民间外交团、星期天午餐会、绘画技艺部等。这些社团每周或每个月都组织活动，活动涉及音乐、艺术、历史文化、运动、电脑、外语等广泛领域，成为促进新老人之间交流与身心健康的重要媒介。

（二）举办各种论坛。新老人会东京总部及地方分会还经常举办大小论坛。论坛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探讨健康、思想文化、历史和时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而日野原会长是论坛的常客，虽为高龄但每年参加很多论坛并做演讲，听众也是经常人满为患。邀请歌手等加入音乐要素也是论坛的一大亮点，很好地体现了日野原所提倡的音乐健康疗法。

（三）“树人千年会”和“生命与和平森林”活动。“树人千年会”是九州分会为保护自然环境开始进行的用认证自己人生的种树来代替造坟墓的活动。他们在福冈市郊区已种植了 2000 多棵树。信州分会也着手“生命与和平森林”构想。他们借用松本市阿尔卑斯公园附近的公有土地开始种植认证自己人生的“生命之树”，为扩大绿地和森林面积做出了贡献。熊本分会则开始了在个人所有的山坡上种植樱花树的活动，至今已经种植 200 棵，每到樱花盛开的季节来迎接众多赏樱游客。

（四）举办“生命课程”及传承战争体验讲座。“生命课程”是日野原于 1987 年开始的主要面向小学生的讲座。“生命课程”对寿命、生命、家庭、生病、和平与宽恕他人等问题进行讲解，给孩子们讲述生命的重要性和意义是“生命课程”的主要内容。为了让更多的孩子知道“生命课程”，从中得到生命指南，日野原把“生命课程”整理成名为《献给十岁的你——来自 95 岁的我》一书出版。这种“生命课程”可以帮助孩子们对自己的生命过程获取更加清晰一点的认识，规划好今后的人生。

四

引领新老人运动的日本新老人会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老年人不但能够自立，创造实现自我的空间，还可以为下一代和整个社会做很多有益事情的事实。体弱多病、无所事事、颐养天年、增加家庭和社会的负担等等是人们对老年人的传统观念。过去，很少有人往积极的方向思考老年人和老年问题，日本新老人运动试图转变这种消极片面观念，让人们对老年人及其晚年生活树立一个崭新的认识，创造出老年人的新形象，使老年人和社会各界重新思考不可忽视的老龄化问题。

2017年7月18日，新老人会的创始人日野原重明因呼吸衰竭逝世，享年105岁。这位超长寿和超人气新老人的去世无疑对日本和世界的新老人运动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新老人运动的理念是超前卫性的，相信日本等世界各国的日野原重明的继承者们将他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把他的“新老人精神”代代相传。

日本新老人运动为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社会指明了方向，它的普及也将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新老人运动的自己照顾好自己，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增进老年人间的交流等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与此同时，年迈的他们为下一代教育、生态保护与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也是全世界老年人和年轻人值得学习的壮举。

赵朴初民间外交实践与“黄金纽带”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所 尹 虎

赵朴初先生（1907-2000年）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是佛教对外交往的开拓者和先行者，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要职。他以“人类的和平友好是佛教徒的历史使命”为座右铭，为社会主义外交事业和世界和平友好事业的顺利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赵朴初先生本人也被尊为“二十世纪伟大的和平使者”，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佛教界与周边国家间的友好往来被迫中断。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先生积极推动以佛教文化交流为载体的民间外交与“黄金纽带”，在恢复新中国与日、韩国等周边国家间传统友好关系的过程中所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深入探讨赵朴初先生有关中国佛教历史传统与现实功能的独特理解以及对中国佛教国际交流方略的远见卓识，寻求其对当今宗教对外交往的启示作用，不仅有助于佛教文化交流有效发挥补充和助推国家外交的社会功能，还能大力促进佛教文化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必要进一步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重启战后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

二战结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了一条“否认中国，承认台湾的对华政策，导致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低谷，官方沟通不畅。为了解决这一僵局，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试图从民间交流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新局面。在中日关系艰巨难行的背景下，赵朴初先生积极响应中央方针，力图通过恢复中断多年的中日佛教界的传统友谊来推动中日民间友好交流。

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正好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历史机遇。来自17个国家的佛教界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也包括日本佛教界13名代表。为了向日本佛教界转达中国佛教徒们对日本人民的友谊及对中日友好的美好愿望，会后赵朴初先生特意向日本代表团赠送了一尊药师如来佛坐像。这一举动立即引来日本佛教界高度重视，日方成立专门的奉迎委员会来处理此事，并于1953年1月12日举行隆重的接收仪式来迎接佛像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佛像奉迎委员会以此次中日交流活动为契机，在日本佛教界开展了反思侵略历史的活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1953年1月25日，佛像奉迎委员会致函中国佛

教协会,对日本佛教界在战争期间,没能依照佛教和平精神,为防止战争而做出努力,已致中国蒙受重大损失而表示由衷的忏悔,并表达了希望与中国佛教界密切联系,携手共同发扬佛教和平精神,为亚洲及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强烈意愿。中国佛教协会对于上述日方勇于正视侵略历史并对此进行深刻反省,以悔罪的心情来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表示了由衷的欣慰和赞赏。

为了表示对和平和友好的真挚愿望,佛像奉迎委员会为核心的日本佛教界友人们进而开展了将战争期间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俘虏和劳工遗骸送还中国的活动。1953年2月17日,“中国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日本京都东本愿寺法师大谷莹润担任委员长。1953年至1955年,日本佛教界友人历尽坎坷和曲折,先后10次护还中国劳工的遗骨共计3000多具。中国政府和佛教协会高度评价了上述日本佛教界友人的努力与付出,并深表了由衷的谢意。每一批护送遗骨的日本佛教界人士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同时获得了中国佛教界以及社会各界代表们的隆重而高规格的欢迎与接待。

赵朴初先生赠送药师如来佛坐像的举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效应,助推了中日佛教界乃至整个民间交流的发展进程。1953年8月,在第一次护送中国殉难人员遗骸代表团抵京之际,中国佛教协会作为中国佛教徒的代表组织,以半官方的形式接待了日方代表,实现了二战后中日两国佛教界代表间的首次双边会晤。1957年9月,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以高阶珑仙为团长的全日本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此为机会,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官方形式正式会晤了日本全国性宗教组织代表,毛泽东主席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代表团一行,对日本佛教界为中日友好作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日佛教界交流的强化,半官方组织的引领,中央政府的外交介入等局面的出现,大大拓宽了对日外交的政策边界,为中日两国敌对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1952年10月开始的重启中日佛教界友谊的努力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力支援了民间贸易协定(1952年)、护送日侨回国(1953)、民间渔业协定(1956年)、释放日本战犯(1957年)等一系列中日友好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开拓中日民间友好交往新局面

为了不断加快中日友好交往的步伐,赵朴初先生尽心竭力,积极摸索发展中日友好事业的可行性,在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成功利用“鉴真大师逝世1200周年”“鉴真塑像回国巡展”等有利时机,大力推动了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1960年7月,池田勇人政府执政后推出了与其前任岸信介政府不同对华政策,表示在中国问题上“不必采取与美国同样的态度”,给中日关系的好转提供了良机。1962年恰逢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赵朴初先生审时度势,认为这是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友谊的难逢之机,于

是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日两国共同举办纪念鉴真和尚逝世 1200 周年活动的政策建言。赵朴初先生认为，有关鉴真大和尚的题材可成为中日两国佛教界交流互动的重要线索，有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的培养，进而使佛教文化为载体的民间交流产生“以民促官”的外交作用。周总理非常赞赏赵朴初先生的此建议，经中央同意，由赵朴初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的“鉴真大和尚逝世 1200 周年纪念委员会”正式成立。

在赵朴初先生积极推动下，中日宗教界、文化界携手合作，共同筹备此次佛教文化盛会，引起了中日人民的广泛关注。日本佛教界还将 1962 年、1963 年设定称之为“鉴真年”。中日两国都在全国范围内陆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各种纪念活动来宣传和纪念将一生奉献于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的鉴真和尚。其中，1963 年 9 月在扬州大明寺举行的“鉴真大和尚逝世 1200 周年纪念活动”则赢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佛教界规模最大、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国际性盛典的殊荣。

实际上，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 1964 年。由于纪念活动时间周期长，参与人数多（当时日本佛教徒占国民总数的 80%），活动范围广，最终发展成为两国佛教界加强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群众性热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持续三年之久的“鉴真年”纪念活动起到了“以民促官”的良好作用，有效推动了首相池田勇人和外相大平正芳等日本领导人对华友好政策的实施。

1962 年 9 月，池田首相派特使松村谦三来华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交流过程中双方明确了“民间外交”在改善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1964 年 4 月，双方进而成功签署了《中日在对方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和联络处及相互交换记者的协议》。

然而，1964 年 11 月，佐藤荣作内阁上台以及中国“文革”动乱的开始，却给刚刚处于稳定的中日友好事业蒙上了阴影，带给中日两国友好人士巨大挫折，中日关系也再次陷入动荡期。尽管如此，两国民间的友好交往所奠定的群众基础已经形成，两国人民从未中断过努力维护已取得的外交成果，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恢复邦交的不懈努力。直到 1972 年 7 月，佐藤内阁下台，新上任的田中角荣首相改变对华敌对策略，着手推进邦交正常化进程之后，中日关系才真正迎来了转机。

在中日两国共同努力下，双方于 1972 年 9 月 29 日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关系从以“民间为主”走上了“官民并举”的阶段。而且，1976 年“文革”的结束和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向中日关系的提供了新的发展局面。

1978 年 4 月，以赵朴初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文革”后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组团访日，取得了空前的圆满成功。这次访日过程中，赵朴初先生与唐招提寺住持森本孝顺长老会谈，协商了让鉴真和尚坐像回国“探亲”的可行性。在新形势下，鉴真大和尚这一题材再次成为中日两国佛教界加强友好交流的纽带，展现出两国人民对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强烈期待。

在赵朴初先生的大力倡导下，随后 1978 年 10 月访日的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和邓颖超人大

副委员长参观唐招提寺，与森本长老的进行会谈，由此，鉴真像回国巡展成功提上了日程。为了迎接佛像回国巡展，我国专门成立了以赵朴初先生为主任的“全国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委员会”开展了紧张的筹备工作。1980年4月18日至5月28日，在森本长老亲自护持下，鉴真和尚像先后送到扬州大明寺和北京法源寺，接受众多同胞的瞻仰和礼拜供养。叶剑英、邓颖超和班禅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迎接鉴真像的欢迎活动。

以鉴真像回国巡展为契机，赵朴初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友人以鉴真为文化载体，携手并进，再次掀起了中日“民间外交”的新高潮，大幅改善和恢复了长期中断的中日佛教界友好交流与互助局面。不仅如此，以两国佛教界交流为联系渠道，中日两国政还推进了文学、艺术、医药等领域的交流互动，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构想的提出

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变，中日关系也随之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在1992年即中日复交2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与日本领导人协商了共建构向21世纪新的合作关系，稳步发展中日友好的合作方略。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对日政策总统体现出“双边逐步向多边合作发展”和“以多边合作来促进双边关系”这两种模式共存、相互促进的崭新的局面。

为了积极迎合新时期我国对日外交的方针新变化，1993年9月，在京都召开“日中佛教友好交流纪念大会”上，赵朴初先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提出了著名的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这一新的构想。

他明确指出，中日韩三国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许多纽带把三国密切联结在一起。其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璀璨耀眼的纽带，那就是三国的佛教徒通过释迦佛祖的宗旨，从古至今结成了牢固的共同信仰的纽带，可称之为：黄金纽带。

赵朴初先生认为，这条纽带史自有来，源远流长，在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中一直发挥着有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值得我们珍惜、爱护和继续发展。

赵朴初先生联系当时世界局势，进而建议道，中日韩佛教徒应积极继承和发扬友好合作的传统，要使这条黄金纽带更加牢固，重放光辉，使其联结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做出贡献。赵朴初先生这一深化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黄金纽带”构想，立即得到日韩两国友人赞同和共鸣。

为了巩固“黄金纽带”和加化中韩日三国佛教界友谊，经过三国佛教界的友好协商和积极筹备，首届“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于1995年5月22日在北京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

三国代表共有 105 人，还有 500 多名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朋友列席会议。三国佛教界代表集聚一堂，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共同探讨为人类和平与幸福做出佛教徒应有的贡献的方式和路径，称三国佛教交流的划时代之举。值得强调的是，在此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在回顾二战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的基础上，呼吁三国佛教徒应提高警觉，伸张正义，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引起了各国舆论的广泛关注。

在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亲切会见了三国佛教界代表，同时高度评价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的此次会议体现出中日韩佛教界和三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相信必将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起到积极作用。

在北京会议以后，第二、三届“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又于 1996 年和 1997 年先后在首尔和东京举行，每次会议不管是规格、参与人数还是影响，都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峰。

在赵朴初先生的倡议下，三国佛教界以“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为核心，携手建立起了各种交流机制和各级会谈模式，同时以此为平台，积极开展了与佛教息息相关的政治、社会、宗教、和平、环境等相关议题的对话。此后，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平台的相关活动都没有中断，经受风雨洗礼，历久弥新。这一局面又加快了“黄金纽带”构想的传播，加深三国人民间的友谊，推动了和平与发展的氛围在东亚地区的形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对赵朴初民间外交与“黄金纽带”的继承与发扬

继承和发扬赵朴初先生的民间外交与“黄金纽带”，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加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新世纪的到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显著变化，各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为注重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以佛教文化为基础的对外交往和“黄金纽带”在我国对外交流和宣传中发挥着作用，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政治价值，应当继续加以发挥。

第一，赵朴初先生的民间外交和“黄金纽带”是充分发挥宗教在对国际交流中积极作用的重要实践成果。它充分体现出以佛教文化为途径的国际交流，对增进国家间友谊和相互了解，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有必要鼓励佛教界乃至整个宗教界在坚持独立自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外交流交往与合作，更好地服务国家整体外交大局，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第二，继承和发扬赵朴初先生的民间外交及“黄金纽带”是宗教界继续扩大外交辅助作用的重要路径。赵朴初先生作为佛教界的杰出领袖，毕生致力于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事业，成为

新中国建立以来三代领导集体对日、对韩外交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实践者，为促进中日韩民间友好交往作出了卓越贡献。1977年11月，赵朴初先生致乌兰夫等中央统战部领导的信函《关于当前佛教情况和对外关系问题的看法》中多次强调佛教外交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将宗教看作一个渠道，以此争取和团结广大国际友人，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顺利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佛教交流作为重要的公共外交形式，是国家外交的有力补充，应给予充分重视，进一步强化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独有的社会功能，促进佛教外交及佛教对外交流在国家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基于对佛教思想内涵的深刻领会和对当代社会的透彻认识，赵朴初先生总结出佛教的和平思想，包括佛教的慈悲观、利他观、平等观等。赵朴初先生的佛教和平观充分体现在战后中日民间交往的恢复与发展进程中。赵朴初先生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睦相处，共同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可以说，赵朴初先生以“和”为贵的包容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中国佛教文化独特的思想资源与历史性启迪，有必要给予充分重视。同时我们还需积极向世界介绍“黄金纽带”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和平思想和实践案例，加深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第四，在中日韩三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赵朴初先生努力构建起的三国佛教定期交流机制和各级会谈模式不仅成为联结三国佛教界友谊的重要途径，还发展成为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平台。在“黄金纽带”理念的引导下，三国佛教界友好交流的内容不断丰富，涉及弘扬佛法、佛教戒律、人类和平、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宗教对话等诸多方面。三国佛教界人士尤其在保护环境、维护和平、合作开展慈善救济事业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至今，随着我国宗教状况的变化，佛教文化交流的作用领域将不断拓宽，我们有必要加强佛教文化作为友好交流纽带和桥梁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中日韩佛教交流机制，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以及世界和平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五、结语

佛教是亚洲许多国家的文明传统，因此加强佛教的国际友好交流，则是继承与发扬长期友好合作的文明传统，也是对历史的回应，更是一种文明的展望与开拓。以佛教为纽带的交流活动历来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先生积极推动佛教民间外交及“黄金纽带”的恢复，为中日韩三国传统友谊的修复、中日和中韩邦交正常化、战后东亚地区的稳定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在这一

过程中，赵朴初先生在发挥宗教界的积极作用、推动中外友好往来、促进世界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等领域展现出充满智慧的远见卓识，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

毋庸置疑，继承和弘扬赵朴初先生佛教外交与“黄金纽带”理念等宝贵精神财富，将会对区域和谐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产生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继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摸索和改进佛教文化交流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最优运用模式，推动我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持续做出贡献。

邵亭金永爵《燕台琼瓜录》考述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文哲

朝鲜文人邵亭金永爵是 19 世纪中后期朝鲜汉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诗人，亦是中朝文人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但迄今为止对于金永爵及其《燕台琼瓜录》的学术评价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燕台琼瓜录》为孤本，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载录金永爵和晚清文人之间的唱和诗、赠答诗、送别诗、赠序题跋、赠文赞文、祭文等共 58 篇诗文，此文集是反映 19 世纪中后期朝鲜使臣与清文人来往信息的重要文献，亦是考察金永爵和晚清文人交游关系可资借鉴的极为重要的资料。《燕台琼瓜录》所载的诗文不仅揭示近代中朝文人在思想、学术、情感方面的积极交流，而且呈现出两国官方文人对东亚以及中朝关系的认知定势。

一、邵亭金永爵

朝鲜文人金永爵（1802-1868），字德叟（寔），号邵亭，庆州人，忠州牧使金思植之子，忠献公金弘集之父。高祖庆恩府院君孝简公金柱臣，世父敬献公金思穆。金永爵出身名家庆州金氏家庭，深得慈亲垂爱，早年随从大提学徐有渠、奎章阁提学尹定铉、洪吉周等求学，并结交金尚铉、徐有英、赵冕镐、洪翰周、尹正镇、洪祐健、徐承辅、申弼永等诗词同道，成立诗社且编纂诗卷《北山秋吟》，同时与朴珪寿、申锡愚、洪良厚等朝鲜北学派继承人交往甚密。

金永爵性格敦厚，博览群书，交游广阔，特别是对诗赋唱和的满腔热忱，使他与诸多朝鲜文人相识相敬，结下了数十载的深厚情谊。同时，金永爵倾尽四十余载岁月结交了李伯衡、帅芳蔚、李銜、赵光、程恭寿、吴受藻、魏文翰、叶名沆、吴昆田、张丙炎、杨传第、陈翰、袁惟宝、乔松年、观祐、管晋勋、张祥河、孔宪彝、许宗衡、董文涣等诸多清文人，并且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在 19 世纪中后期中朝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金永爵和清文人之间的交流资料收录于金永爵撰《邵亭诗稿》、《邵亭文稿》，金永爵编撰《燕台琼瓜录》、《存春轩诗钞》、《中朝学士书翰录》、《无题》，董文涣编《韩客诗存》，藤本幸夫编《日本现存朝鲜文献研究：集部》等书册中。

二、《燕台琼瓜录》述略

《燕台琼瓜录》，笔写本，写年未详，朝鲜金邵亭纂次（原题名下署名作“存春轩”，“存春轩”为邵亭金永爵书斋名），孤本，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编号491771，图书检索号921.3-5）。1册2卷（卷首署“存春轩纂次”），上下单边，左右双边，半框20厘米×14.5厘米，有界，10行20字，小注双行，上下大黑口，线鱼尾，25.8厘米×15.6厘米。《燕台琼瓜录》现仅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特别本阅览室贵重书室。

迄今为止，天理图书馆分三批整理编纂绝版藏书目录《天理图书馆稀书目和汉书之部》：第一卷（1940年版）收录日汉文古籍650种、第二卷（1951年版）收录日汉文古籍922种、第三卷（1960年版）收录日汉文古籍3201种。经查询天理图书馆特别本阅览室公开的“贵重书和汉书”目录，可窥知《燕台琼瓜录》被收录于1960年版的《天理图书馆稀书目和汉书之部》第三卷书目中（编号：kisho-wa-03），但其文本内容尚未公开。

《燕台琼瓜录》为孤本，书尾有两枚藏书章，其中一枚藏书印是“昭和31年1月14日，天理教教会本部”，另一枚印文是“天理图书馆藏”。通过天理图书馆特别本影印室的说明可知，《燕台琼瓜录》是由天理教教会本部于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1月14日向天理图书馆捐赠的朝鲜汉籍。至于该朝鲜孤本是在何时经过何人流传到日本、中山正善是在何时何地经过何人访购此书、其收藏家以及来历等有关此书的流布递变之事，天理图书馆特别本影印室表明，目前没有发现相关记载，无法确认该书的流传渠道。

《燕台琼瓜录》载录金永爵和晚清文人之间的唱和诗、赠答诗、送别诗、赠序题跋、赠文赞文、祭文等共58篇诗文，所涉及的文体多样，包括五律、七律、七绝、五古、七古、四言等。其收录的诗文写作时间为1859年至1969年之间。其中，1859年金永爵在京时的笔谈唱酬诗有21题32首，回国后与清文人书信往来的诗文有37篇。《燕台琼瓜录》卷一被视为金永爵本人纂次，所载金永爵与清文人之间的笔谈、书信往来中的诗作共47题67首。卷二所载金永爵与清文人之间的赠文、赞文、序跋、祭文等共11篇。

三、《燕台琼瓜录》的文献价值

《燕台琼瓜录》是反映19世纪中后期朝鲜使臣与清文人来往信息的重要文献，亦是考察金永爵和清文人交游关系可资借鉴的极为重要的资料。《燕台琼瓜录》的文献价值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就诗词化用而言，《燕台琼瓜录》所载的金永爵诗作中有多处呈现以明用或暗用的方法将唐宋诗词融入诗中的特征。化用前人的诗词可谓古已有之的创作方法，亦是点石成金的写作方式。例如，金永爵《上元玉河馆偶作》云：“四海茫茫知己少，玉河空作楚囚悲。”其中“玉河空作楚囚悲”一句化用李白《金陵新亭》中的“四坐楚囚悲”，流露出诗人如同楚囚一样孤

独伤感的心情。究其实，1858年10月26日，金永爵以冬至副使的身份随任正使的李根友、书状官金直渊离开都城汉阳，同年12月25日到达燕京玉河馆。

当时玉河馆又称“上元馆”或“高丽馆”，设于燕京玉河西岸上，用于朝鲜使臣外交活动的办公及接待，便留下了诸多朝鲜使臣在京时的痕迹。这一诗作，一方面表达对叶名沆的敬仰之心以及对其作《敦夙好斋集》的感悟。金永爵被润臣的慷慨失志之音所深深打动，通过这首诗表达出渴望得到千古知音的心愿。另一方面怀念与李伯衡之缘。金永爵和李伯衡的书信因缘可追溯到1827年，当时洪大容之孙洪良厚随冬至副使申在植赴京，在此次燕行中，洪良厚向李伯衡推介朝鲜文人的诗文，其中李伯衡对金永爵的《货喻》一文赞叹不已，便写三首诗赠送给金永爵。1858年冬至使行中，金永爵造访李伯衡宅邸，然而李伯衡数年前赴河南任职河道总督，尚未返回燕京，这使金永爵大失所望。

李伯衡和金永爵的书信往来历经三十余载岁月，两人一生未见，然而一世怀念。又如，金永爵《奉寄陈少岩（翰）》一诗中有云：“庭院寥寥几满尘，问谁来接海东宾”其中“庭院寥寥几满尘”一句化用宋代诗人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与李清照《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中的第一句。金永爵将欧阳修和李清照的“庭院深深”改写为“庭院寥寥”，揭示诗人所处环境“庭院”之幽深和凄凉，流露出海东诗人内心的感伤与空虚。再如，金永爵《七月十三晓纪梦，寄程弟容伯》中有云：“君亦此夜同梦不，天涯地角思悠悠。”其中，“天涯地角思悠悠”化用北宋诗人晏殊《玉楼春·春恨》中的“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这是1860年金永爵写给程恭寿的七古长篇，诗人借此抒发对远方挚友无限绵长的怀念之情，两人千里之隔，然而若能一心相同，思念便会无尽处。

此外，金永爵撰《再叠前韵兼以送别》中的“朝衫几日拂征尘，又唱骊歌作去宾”，化用李白《灞陵行送别》中的“骊歌愁绝不忍听”；《叠前韵奉答魏石樵》中的“诗家妙谛转多师，当世才名舍子谁”，化用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奉和蓉舫尚书》中的“心有灵犀照，书从朔雁传”，化用唐代诗人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中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奉寄陈少岩（翰）》中的“晚节蜚声承善祷，寒花明月照怀新”，化用宋代诗人陈师道《次韵李节推九日登南山》中的“寒花只作去年香”。

由此可见，金永爵善于化用唐宋诗词来表达诗韵或诗意，通过各种方式使其与自身情感和心性相结合，恰当地融入诗词的创作当中。这不仅体现了金永爵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而且使其作品无论从文体风格还是思想意蕴来看均显得典雅而内涵深厚。究其根源，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推动晚清文人的宋诗运动，随之在近代诗坛上出现相当声势的宋诗派，其人其诗对朝鲜文人的诗词创作起到深刻影响。金永爵亦不例外，处处引经据典、托物言志的修辞手法则是金永爵诗作的特点之一。

其次，就交游情况而言，《燕台琼瓜录》是见证金永爵和晚清文人交往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所载录的见闻具有不容小觑的个案叙述价值。始于北宋的中国实学在晚清时期以新学风和新士

风的精神取向试图转型，结果使实学向着近代性转变，成为“近代新学”兴起的思想根源。晚清时期的“顾祠修禊”文人“讲求实学”，勉励“新学风和新士风”，被后世称为“朝士之秀”。

金永爵与叶名沆、张祥河、孔宪彝、吴昆田、许宗衡、董文涣等“顾祠修禊”文人的交往集中在1858年以后，可谓近代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例如，据吴昆田《朝鲜使者笔谈记》所述，“朝鲜使者金邵亭以年贡来，闻叶子润臣之贤而就见焉。言语不通，相为笔谈，知润臣之家汉阳也”。据此可知，金永爵与叶名沆的初次见面是在1859年其停留燕京期间，当时金永爵因叶名沆之贤名而主动造访其人。

在燕京期间，两人数次相聚，金永爵自云：“迨我入燕，与君邂逅，推襟送抱，倾盖如旧。广盛之局，虎坊之桥，杯酒叙欢，乐哉陶陶。”叶名沆在金永爵离京之前，即二月二日在位于虎坊桥西边的府邸招集一批“顾祠修禊”文人与金永爵交流，“阅两时许，尽十余纸，洋洋洒洒，不下五千言”。此次笔谈围绕着金永爵的家世与出身、朝鲜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即科举制度及其流程、官职制度及其弊端、内部党争和门阀政治横行等问题交换意见，还纵论朝鲜谱牒、朝鲜换钞法、日本国驳斥洋教之事、清阴金尚宪“尊明斥清”之事等话题，可谓富有经世致用之思想意蕴的中朝文人笔谈交流活动。

又如，金永爵《奉寄李子廉（衔）》云：“瓠歌应和看云句，槎影方瞻犯斗躔。”诗人在此借用汉武帝刘彻的即兴诗作《瓠子歌》来表达对李衔的赞颂，其寓意为李衔跟随河道总督治理黄河水患，利用制作树木木栅笼等办法治理洪水，改变自然界水患横行的局面。在此揭示金永爵对怀有经世抱负的晚清“顾祠修禊”文人的仰慕以及注重治事救世和实体达用之理学思想。再如，金永爵《奉呈张诗舸尚书》一诗中有句：“词苑宗匠推渔洋，后来磊落遥相望。扬挖古今亲风雅，流连花草爱景光。”“诗舸”则是张祥河的号，金永爵在冬至使行中听闻张祥河的大名，然而当时未曾造访诗舸府邸，回国后金永爵转托赵光向张祥河赠诗，之后两人通过书信方式诗文赠答，相互表达其敬慕之忱。诗中借用王士禛之名赞颂名家文人的风雅，认为他们继承古人情趣之高雅而写出美好的自然光景，并表达热爱生活和探索自然的实测之学。可见，金永爵与“顾祠修禊”文人的笔谈交流和书信往来，不仅呈现晚清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缩影，而且折射出两国文人在西力东渐后谋求救国图存与安邦定国的相同命运。

最后，就收录情况而言，《燕台琼瓜录》是最为完整地收录金永爵与晚清文士来往诗文的选集。《燕台琼瓜录》卷一所载诗作中，除金永爵撰《上元玉河馆偶作》一诗外，其他署名为金永爵的18首诗和1篇祭文见载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存春轩诗钞》，而清文人署名的47首诗作，除叶名沆《邵亭先生见名沆旧刻诗稿，辱承奖饰，赋此奉谢，兼以送别》和《邵亭先生居蓉江之上，葺园筑楼，具水木清华之胜》二首送别诗以外，剩余45首诗作均未见载于金永爵的《存春轩诗钞》《邵亭诗稿》《邵亭文稿》和董文涣编《韩客诗存》等书册中，亦不见载于现存的清人文集。

《燕台琼瓜录》卷二所载文章中，程恭寿《存春轩记》和《朝鲜侍郎金邵亭先生仁兄文》、

金永爵《唐昭陵陪葬碑全部拓本跋》、孔宪彝《昭陵碑论略》、张丙炎《书存春轩诗钞后》和《祭金邵亭侍郎文》6篇文章只见载于《燕台琼瓜录》。此外，吴昆田《朝鲜使者笔谈记》虽录入《韩客诗存》中，但有不少文字阙失，载录于《燕台琼瓜录》中的此文内容更为准确完整。归纳言之，有关金永爵和清文人之间的交流资料主要收录于由金永爵撰或编撰的6种文集中，其中《邵亭诗稿》《邵亭文稿》《中朝学士书翰录》《无题（金永爵与清人来往尺牍帖）》4种文集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成均馆大学尊经阁、高丽大学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馆，《存春轩诗钞》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唯有《燕台琼瓜录》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而且《燕台琼瓜录》卷一所载的46首诗作和卷二所收录的6篇文章均未见载于金永爵的其他书册或现存的清人文集中，故其文献史料价值尤显珍贵。

学术动态

“东亚、东南亚与世界汉学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杭州举行

2023年10月14日至15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东亚、东南亚与世界汉学：2023浙江大学-哈佛大学世界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本次大会得到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等各国和地区著名学者的响应。

大会总议题是“东亚、东南亚与世界汉学”，下设五个分议题：东亚东南亚文学与世界汉学、东亚东南亚历史与世界汉学、东亚东南亚哲学与世界汉学、东亚东南亚教育与世界汉学、东亚东南亚及世界汉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会议收入论文46篇，举行主题演讲20场，主旨发言24场，评论8场。

来自哈佛大学、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0余位海内外高校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学术盛会。



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进研究员与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James Robson 教授共同倡议，延续疫情期间线上线下三届工作坊的合作传统，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担当和工作态度，以共同关注的学术话题，团结海内外顶尖学者，促进世界汉学研究发展，彰显“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对危机时因应变化的韧

性，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世界共赢共享做出努力。

会议旨在关注东亚、东南亚两个重要地区，展开文化的、文明的共享与对话，思考东亚、东南亚两个地区之间互为联系、互相影响的历史关联，探讨两大地区和世界汉学发展的建构关系，厘清两大地区与世界汉学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意义。大会试图通过从学术理论和研究实践的角度正视各类人类所遭遇的问题与危机，从而找到重新出发的多重思路和出路，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世界共赢共享。

（信息来源：浙江大学文学院网 ▪ ）

沈阳故宫博物院举办 “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3年12月5-6日，第20届“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沈阳顺利召开。来自首都博物馆、日本江戸东京博物馆、韩国首尔历史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的代表和相关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会议。



“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博物馆、江戸东京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交流机制，始于2002年，由4个博物馆每年轮流举办，针对博物馆发展的不同议题，通过学术研讨、展览合作等形式进行共享互鉴。

本次研讨会以“博物馆与城市美好生活”为主题。4个博物馆的8位代表结合各自博物馆的实践与特色，对博物馆如何在构建美好生活中发挥作用、实现博物馆与城市发展的有机互动等议题分享了彼此的思考和探索。在讨论环节，与会者就各个博物馆在提升服务水平、增强观众体验感等方面的创新理念及实践案例进行了精彩交流，对“构建城市美好生活是城市博物馆的价值取向和共同追求”达成共识。

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沈阳博物馆和沈阳故宫，考察了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展览陈列、文创产品和文博书房。几个博物馆还就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展览合作，以及2024年“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有关事宜进行了会谈，希望通过开展人员互访、展览合作进一步拓宽博物馆之间、城市之间的交流机会，增进三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了解和交流交往，共同构建可持续的美好未来。

（信息来源：沈阳故宫博物院网页）

“东亚书院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杭州万松书院举行

2023年11月9日，“东亚书院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万松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书院学会、韩国书院学会担任指导单位，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凤凰山管理处万松书院承办。

来自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大学院、韩国国立庆尚大学校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专家学者，以及岳麓书院、嵩阳书院、鹅湖书院、万松书院、篔簹书院、七宝阁书院、尼山圣源书院等传统书院和现代书院代表近百名学者参会。

大家围绕“东亚儒学与书院文化”这一会议总主题展开研讨，进一步推动中国书院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传承中华书院优良传统，促进当代书院建设与发展，加强国内外书院文化交流与合作。书院作为儒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文化传承、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重要功

能，对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承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 2006 年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韩国国民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举办首届“东亚书院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广邀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书院专家学者及各类书院管理者汇聚一堂，共同交流与探讨书院文化，持续推进书院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专家学者分别就“韩国书院的人文性与西方修道院比较”“朱子讲学赋诗与书院的学术功能”“书院学与科举学”“王阳明与书院”“儒学在日本的接受传播”“晚清书院士子的报刊阅读与知识转型”等主题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深刻阐述了书院文化对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影响与价值，为后续会议主题研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会议的分会场讨论在万松书院举行，共设立韩国与日本书院研究、当代书院建设与藏书研究、阳明学与浙学、书院文化转化发展、书院专题研究、博士生研讨等专场。三个分会场的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书院与儒学”会议总主题展开交流，涉及思想史、文献学、哲学史、社会学、文学史等多个学科研究领域。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书院文化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全面梳理书院前世今生及未来走向，并积极为传统书院与当代书院转化发展建言献策，持续推进书院文化国际化。

（信息来源：杭州网）

“中日韩木质文化遗存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昆明召开

2024年1月25日至27日，由西南林业大学主办，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的2024年中日韩木质文化遗存保护研讨会在昆明召开。

本次会议以“木质文化遗存保护区域交流合作”为主题，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全南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嘉耕考古学研究所的10余名外国专家学者，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学者及西南林业大学师生共计60余人参会。

推动文物保护利用科技创新、全面提升考古研究水平、加强文物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云南省“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任务。与会专家就各自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作了分享汇报，加强了林业工程领域的交流探讨。同时，参观了西南林业大学木材标本馆，同该校邱坚教授及团队成员就木材识别与鉴定技术及其在木质文物遗存的保护利用与创新领域进行了深度交流。



会议期间，参会人员还对西南林业大学木材标本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考古体验馆、云南民族博物馆进行了学术参观，就木质文物考古研究成果与技术领域相关问题开展交流和学习。会议还组织专家学者赴古城村考古遗址、石寨山考古遗址和李家山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以昆明市、玉溪市大量出土的木质文物遗址为研究案例展开学术研讨。通过古滇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研学，与会成员提出众多创新性建议，有效促进了对古滇国历史的认知与理解。

韩国崇实大学举办 “2024年东亚人文学者学术会议”

2024年4月19日至20日，“2024年东亚人文学者学术会议”在韩国崇实大学举行。本届学术会议由韩国 HK+事业团和崇实大学联合主办，崇实大学，韩国外大，辽宁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



本次会议围绕近代转换时期中国小说的韩半岛传播与影响为主题，积极开展中韩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探讨，为东亚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议。此外，本次会议还围绕有关文化与文明层面的交流互鉴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近年来东亚学界建立了多个不同层级、涵盖不同领域的跨文明对话机制，并提出了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与文明互鉴的全球文明倡议。“东亚人文学者学术会议”强调，东亚区域内文化多元色彩蕴涵了共融共通的因子，区域内各国应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各国最大公约数，推动文化领域的互鉴共融。可以说，本次会议对这一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构建东亚区域文化交流与互鉴共融的合作平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

